

民国教育记忆与教育历史研究刍议 以自传、回忆录为例 *

■陈桃兰

摘 要 在自传、回忆录中有大量关于民国教育的回忆。这些记忆虽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基本能反映出民国教育的现实。对这些记忆文本中的民国教育叙事进行分析、解读,不仅可以为民国教育研究拓展视野、补充“细节”资料,还可以为当代教育发展及个人成长提供借鉴与启示。现有研究已在教育记忆与教育历史理论、教育口述史以及民国教育记忆的文本解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我们可以从研究理论、研究内容、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不断地补充完善。

关键词 民国教育记忆 教育历史 自传 回忆录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33X(2020)07-000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民国时期的教育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这反映出人们对当下教育改革实际情况的不满和焦虑,试图从历史中寻求救治的良方,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民国教育的隔膜和理想化,把对美好教育的理想移情于民国时期,借以观照当下。在这种背景下,大量民国时期人物的自传、回忆录被挖掘、整理出来。这些人物大多是民国教育的亲历者,在其自传、回忆录中留下了关于民国教育的生动记载和第一手资料。这些记忆是他们对所经历的教育鲜活证词,也是他们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对民国教育的重构。通过对这些文本的阅读、比较和分析,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呈现出民国教育的面貌,并为当前教育提供借鉴。

一、自传、回忆录中民国教育记忆的真实性

(一)什么是记忆

所谓记忆,“就是人们对经验的识记、保持和应用的过程,是对信息的选择、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1]。具体来说,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感知各种事物、产生各种思想和感情,这些都可以作为经验经过大脑编码加工被储存下来。可以看出,记忆的内容来自于客观世界,并且可以长时间地保留在大脑中。从这一角度看,记忆是可信的。可以断定,在民国教育亲历

者的记忆中,必然含有能反映当时教育现实的内容,但也不可否认,记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它与个体的其他心理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个人经验。人们在认知周围事物并储存信息时,往往会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进行有意无意的联想,在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会曲解新信息,特别是“在记忆一些我们头脑中并没有参照物的信息时,我们会将其与自己熟悉的东西联系起来”^[2],这就使记忆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差,从而影响记忆的可靠性。而且,记忆具有不完整性,它受本人本身的认知及视野范围的限制,对周围客观世界的编码、储存是有选择的。如果把历史看成是客观不变的史实,那么人们的记忆就是对其部分史实的复制与建构。因此,人们关于民国时期的教育记忆既有客观性的一面,也含有一定的主观性,与当时的教育现实不能完全等同。

(二)什么是回忆

所谓回忆,是指记忆在一定条件下被重新唤醒的过程。“每次对记忆痕迹的再激活同时也是一次对一手经验进行必要变形的重新写入”^[3],是一个建构或重构的过程。对记忆的重构显然会再一次影响其内容的客观性。在回忆过程中,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介入,难免会使事实的呈现发生歪曲、变形、差错。如拥有相同经历的人,回忆的内容却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差别很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一般项目“民国教育的记忆与重构——以自传、回忆录为中心的研究”(项目编号:BOA170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桃兰(1978-),女,浙江磐安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研究。

大,这其中起干扰作用的就是人的主观因素。“心理学研究表明,大脑会曲解我们对于往事的回忆。”^[2]压力、恐惧或疾病等都会妨碍我们对信息的接收、储存和提取。“而且,回忆是对阐释敞开大门的。”每一次阐释都会随着生活经历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3]。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记忆还会被遗忘,甚至与一些相似的事物相混杂从而变得模糊,不易被提取,只有那些与现实有关联或对个体有意义的历史记忆才会被有意识地唤醒。可见,回忆不是对记忆的重复,而是对“过去”进行重新编织、阐释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同时,回忆是以记忆为基础的,记忆的客观性决定了回忆同样具有客观性。当然,人们对民国教育的回忆,虽然会受个人经历、个体喜好、时间流逝及所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但还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三)自传、回忆录中的教育叙事能否反映当时的教育现实

自传、回忆录都是用叙述或描写的方法,把自己对过去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和社会活动等的回忆,用文字形式表达出来。自传是自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包括学习、工作情况及心路变化历程;回忆录可以是回忆自己的,也可以是回忆熟悉的他人或相关的事件。无论是自传还是回忆录的写作者,在进行教育叙事时往往都是站在个人立场,以回忆的方式对过去的教育记忆进行重新提取、建构,其中必然会渗入写作者的主观因素和价值判断。而且,很多时候,自传、回忆录是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写作者出于各种原因,对某些事件可能会进行夸张或虚构,其中也不排除有刻意修饰和拔高,甚至对某些记忆会进行故意回避或掩饰。可见,记忆、回忆与史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记忆文本的描述与史实之间则相距更远。自传、回忆录中对于民国教育的叙述,不可能全是历史真相。当然,歪曲或谬误毕竟只是文本中的极少部分,自传、回忆录大都还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撰写的。尽管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写作态度和风格,但可以判断,真实的回忆与写作是自传、回忆录中的主流。自传、回忆录中关于民国教育的叙事,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民国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况且,去伪存真、努力寻找历史的本来面貌本就是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和职责。在研究民国教育时能兼顾这些亲历者的声音,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客观、全面。

二、以自传、回忆录为中心进行民国教育研究的意义

(一)可以拓展教育史研究的视野

历史的呈现有多种方式,自传、回忆录也是重要的

一种方式。与史书或史料记载不同,自传、回忆录的写作都是基于个人对过去的回忆。这种回忆有“共性”的一面,即属于集体记忆,基本上能如实反映民国教育的史实;同时还具有“个性”的一面,即属于个体记忆,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重构。尽管因记忆的“重构”性特征影响了其真实性,但仍不失其历史价值。通过解读作为见证人的回忆,至少可以扩展我们对民国教育的历史性认识。把记忆理论、方法应用于教育史研究,无疑会拓展教育史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史研究的内容。通过这些文本或许还会给我们解读民国教育提供另一种视角。

(二)可以为民国教育历史的建构提供一些“细节”

在自传、回忆录中有着关于民国教育的丰富信息,特别是有一些一般史料中不会记载的细节。正如陈祥美所指出的:在校史研究中,“校友的回忆录常常(能)补足一般校史中所欠缺的生气与细腻”,哪怕是一些个人的主观感受与想法^[4]。胡适非常看重传记类作品的史料价值,认为可以“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至于史料的真伪,“有训练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5]。教育史研究者可以通过对各种文本的对比,并用史料进行考证,分辨其真伪。自传、回忆录中所展示的作者的 psychological 动机、设身处地的一些看法以及某些教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也都是在历史文本中很难被发现的“细节”资料。显然这些“细节”资料的被发现、证实和利用,可以丰富教育史研究的资料,有助于我们再现或建构民国教育的图景。

(三)可以为当代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对教育记忆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呈现过去,同样可以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借鉴。自传、回忆录中对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叙述,如学校办学、教育管理、课程教学、教育实验等。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都可以为当前教育提供借鉴与启示。而且,由于记忆主体与记忆对象存在着某种渊源,回忆中无论是对细节过程的描写、对教育价值所作的评判还是对教育思想的表达,都难免会带上主观色彩,但也正因如此,文本的书写才带有了一些“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可以跨越时代,为当代教育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参考。“民国教育”已然消逝,但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发展阶段,民国时期的很多教育理念、精神、诉求经过时间的考验与沉淀,已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功能的“社会记忆”,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与影响。因此,对这些文本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中国现代教育的过去,也有助于更好地研究教育现状,并为未来教育改革提供启示。

(四)可以为个人成长提供教育经验与启示

自传、回忆录中包含有大量的人生经验,还包括很多个体的教育体悟,可以为个人成长提供多方面的启示。汪曾祺曾赞叹:《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6]。显然,同为作家的汪曾祺读着《从文自传》深有感触,认为这样的一部自传可以给有志于成为作家的后人一些帮助。自传、回忆录的作者来自于社会各界,不仅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人生经验,而且不同行业或怀抱各种志向的人也可以从前辈们的经验中获得专业成长的启示。

三、以自传、回忆录为中心开展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

(一)以自传、回忆录为中心开展民国教育的研究成果

1. 记忆与历史、文学关系的理论研究

自传、回忆录是基于记忆、回忆基础上写作的文本,它们兼有历史和文学的特点。记忆与历史、文学等关系的理论探讨是该课题研究的理论前提。

西方对记忆的研究开展较早,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被认为是现代记忆研究的开创者,他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他指出,个体通常在社会中获得记忆,并有赖于记忆的集体框架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7]。但在传统史学家看来,记忆还是无法被用来追寻真相的,自传、回忆录等也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受后现代理论及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对记忆的历史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认为,记忆虽然具有重构性,但这种重构“是不断从过去当中重新提取一些不同的东西”^[8]。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认为,“回忆是历史的原材料。回忆存在于话语、文字和脑海中,它是历史学家汲取素材的源泉”^[9]。文学研究者指出文学作品同样具有记忆的功能。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认为,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文学作品可以根据不同的回忆方式(重新)构建过去,它在记忆文化中可以实现两个基本功能:记忆形成和记忆反思^[10]。米切尔·巴斯勒(Michael Basseler)和多罗塞·贝克(Dorothee Birke)则在论文《回忆的模仿》(2005)中具体讨论了文化记忆在文学文本中的演示。多学科视野的交叉融合使历史阐释与文学表现缠绕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自传、回忆录等文

学作品,希望通过其中的记忆来感知历史、研究历史。

国内学者对记忆的研究兴起于21世纪前后,他们除了积极引介国外关于记忆研究的经典著作之外,开始把记忆理论运用于历史、文学等学科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对记忆的客观性、重构性及其历史价值进行了探讨。如罗志田的《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2000)一文分析了“五四运动”之后其当事人根据“当时需要”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的“再创造”及其对后世相关记忆的影响。王明珂指出,历史研究应该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由历史记忆、历史心性分析来探索史实,可以开创许多新的历史研究内容,或延续、补充过去中断的研究传统——如过去古史派学者对于传说古史的研究”^[11]。罗福惠、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四卷本)(2011)分析了百年来各政府、党派及民间社会、历史学者等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在该著作的导言中,罗福惠充分肯定了记忆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12]。另外,《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周新国,2005)、《口述历史的记忆与重构——以〈实庵自传〉和〈四十自述〉为中心》(徐希军,2010)等则对口述史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国内文学领域对记忆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说明记忆、叙事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例如,《叙事、记忆与自我》(邹涛,2014)讨论了记忆、自我建构与叙事之间的关系;《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龙迪勇,2009)指出记忆的空间性影响虚构叙事的内容、主题、结构、形式等各个方面;余华、王侃主编的《文学·想象·记忆与经验》(2011)中部分内容探讨了文学与记忆的关系问题;张瑞德在《自传与历史——代序》(1989)中探讨了自传的类型、形式以及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2. 民国教育口述史的研究

受中西方学界对记忆研究的影响,中国教育史学界也开始重视记忆的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口述史方面。口述史与自传、回忆录一样,都是对过去的回忆,所不同的是,口述史还包含了对记忆的研究。与民国教育相关的口述史可以分成三个系列:

一是相关人物的口述史。近年来,许多教育理论界专家相继有口述史问世。如自2007年至2015年,潘懋元、梁漱溟、王炳照、黄济、顾明远、卢乐山、鲁洁、吴式颖等教育学者的口述史先后出版。这些教育学者出生于民国时代,他们在口述史中回溯了其在民国求学甚至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其他领域的许多著名专家、学者也出版了一些口述史。其中,唐德刚于20世纪50年

代完成采访的《胡适口述自传》集史料、研究于一体,娓娓述说了胡适求学与治学的一生,可谓是口述史的典范。蔡德贵整理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羨林口述史》叙述了季羨林在民国求学及任教的经历。2009年至2014年陆续出版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系列丛书中,十余位老科学家或求学或任教于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教育是他们必谈的内容。各类口述史的收集、整理与出版,保存了民国教育的重要记忆。

二是与民国大学相关的口述史。如《清华记忆:清华大学老校友口述历史》(郑小惠等,2011)、《消逝的燕京》(陈远,2011)、《思源·往事》(马德秀,2012)、《金女大校友口述史》(钱焕琦,2015)、《交通大学西迁亲历者口述史》(1、2册)(房立民,2016)等,包含有大量与民国时期大学校史、名师文化相关的宝贵史料。

三是专题式的口述史。如在《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齐红深,2008)中,一群当时还是“学生”身份的老人讲述了东北沦陷后流亡关内的亲身经历。《民国时期上海女子教育口述研究》(杨洁,2014)则是通过亲历者的访谈,呈现了民国时期上海女子教育的状况。

3. 以自传、回忆录等为中心的民国教育研究

有研究者以自传、回忆录为中心,对民国教育的某些方面进行了解读。《历史的背影:一代女知识分子的教育记忆》(姜丽静,2012)通过对冯沅君、程俊英和庐隐等一生主要教育经历和学术生活的考察,揭示了这一代女性知识分子成长的履迹、心路历程,著作中运用了大量自传、回忆录、口述史等资料。陈祥美的《那些年,我们在上海圣约翰:一群老校友的忆说》(2014)中学校生活的回忆,圣约翰的特色发展,抗战时期与抗战后的政治、社会冲击与影响等几部分内容,主要藉由校友的回忆录、自传及访谈资料为中心进行梳理。硕士论文《民国大师的童年与语文学习研究》(石佳佳,2015)以回忆录、传记等作品为主,通过对沈从文、钱钟书等童年故事的重温,考察了民国不同时期的语文教育。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自传、回忆录的读后感式的论著,如《冰心,语文教师的骄傲——读冰心〈自传〉中的〈当教师的快乐〉》(陈树民,1999)、《〈从文自传〉述评》(向洁,2011)、《〈上学记〉对语文教育的启示》(顾之川,2016)等的分析中都有涉及民国教育的内容。

(二)以自传、回忆录为中心开展民国教育研究存在的不足

纵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

发展,西方的记忆理论和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国内也已展开多学科的探索。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对于民国教育记忆的研究在口述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以自传、回忆录为中心进行的研究还非常少见。就目前来看,主要还存在以下不足:

1. 研究理论的不足

尽管教育史研究者已开始注意对于“教育记忆”的研究,但其理论依据还基本停留在对西方少数经典记忆理论的引介和运用之上。研究中虽然借鉴了底层历史视角和集体记忆研究的相关理论,但相对来说,应用范围也非常有限。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记忆研究的多样性拓展研究对象和视野,如可运用创伤记忆理论对战乱中的师生及其回忆进行解读,也可借鉴声誉与声望记忆理论解读著名人物形象的变迁、名校的发展等,分析文化及意识形态对声誉构建的影响,并与史实进行对比,借此还可解释民国热现象产生的深层原因。

2. 研究内容的局限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以自传、回忆录为中心进行民国教育解读的相关成果不仅数量非常有限,研究内容也比较单薄。尤其是那些读后感,对教育只是偶尔提及,甚少作出分析。即使在成果显著的口述史方面,也大都限于对民国教育的回忆,对“回忆”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在分析与解读时,现有研究往往只限于对某所著名学校、某位著名人物或者某类特定群体的教育解读。事实上,在自传、回忆录中呈现的民国教育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包括各个时段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状况、各种教育事件、教育界人物形象、教育思想等,以此为基础,还可以探讨教育与成长、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记忆与历史等相关问题。由此可见,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拓展。

3. 史料运用的不足

把自传、回忆录作为教育史研究资料,是当前教育史研究者的普遍做法,但一般只作为正史之补充,而且被人们所熟知的只是一些著名学校、著名人物的相关文本。一方面,我们可以不断拓展自传、回忆录运用的范围。在教育界人物心态、教育事件及教育思想等研究领域,自传、回忆录都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不断发现、补充自传、回忆录的数量。民国时期受西方个性解放、民主思想和传记理论的影响,以及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大力提倡,一般都写自传或回忆录,文化教育界、军人、实业家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有一些著述存世。还有一些作品可能为文学研究者所熟悉,但未引起教育研究者的重视。因此,尚有很多文本

尚待发现、挖掘和利用。

4.研究方法的不足

关于记忆与教育史的研究,除了口述史研究、文本分析、访谈调查外,研究方法上可以更加多样化。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丰富自传、回忆录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另一方面,除了质的研究方法外,我们还可以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分析民国教育的典型特征。从记忆文本研究教育历史,需要从不同角度理解“事实”和“真相”等概念,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方法论、论著撰写和伦理上的新要求。如何将历史、记忆与伦理整合到一种理想的呈现模式中,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和完善的问题。

综上所述,以自传、回忆录为中心,包括自述、自叙、忆录等,以及一些口述史、访谈录等资料,对其中包含的民国教育的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解读,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其特殊的价值。前人在这一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开拓性的努力,但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如果能从记忆的视角重构民国教育图景,不仅有助于我们找到历史的真相,从而更客观、理性地看待民国教育问题,或许还能为我们找到另一种真实,即关乎人的教育、成长、未来等诸多主题及相互联系的一种真实。

参考文献:

- [1]哈里·洛拉尼.哈佛记忆课(2)[M].徐建萍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2.
- [2]多米尼克·奥布莱恩.多米尼克的记忆魔法书[M].刘祥亚

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35.34.

- [3]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的真实性[A].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C].王 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3.153.
- [4]陈祥美.那些年,我们在上海圣约翰:一群老校友的忆说[J].生命叙事与心理传记学,2014,(1):267.
- [5]胡 适.《四十自述》自序[A].胡适文存:第4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416.
- [6]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A].汪曾祺全集6:散文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52.
- [7]莫里斯·哈布瓦赫.记忆的社会框架[A].论集体记忆[M].毕 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1.
- [8]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A].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C].季 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2.
- [9]勒高夫.法语版序言[A].历史与记忆[M].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
- [10]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媒介[A].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C].吕 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27.
- [11]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136-147+191.
- [12]罗福惠.导论[A].罗福惠,朱 英.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1卷):政府、党派的辛亥革命纪念[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邮编 311121

On the Educational Memory and Educational Hist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aking Autobiographies and Memoirs as Examples

CHEN Tao-lan

(School of Education ,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 There are lots of recollections of th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autobiographies and memoirs. Although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subjectivity in the recollections , they can still basically reflect the reality of the education at that time. Studying and interpreting these educational contents will not only broaden our view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into the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provide lots of detailed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esent education and personal growth.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into such aspects as the theory of educational memory and history , o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onal mem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can further our study from the theories , contents , materials and methods on this topic.

Key words : educational mem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educational history ; autobiographies ; memoirs